制度的重要性

摘要

近年來諸多學者開始強調制度的重要性，認為經濟成長的成功與否會取決於制度的品質。不過也有些學者認為因果關係應是另一方向的，即成長影響制度。這方面的實證研究日漸增多，多數顯示制度與後進國家的所得有相關性。無論因果關係究竟是如何，就政策角度來考量，後進國家若能改善制度的品質，應該是可以達到提升生產力的效果。

但是這其中的意涵並不清楚。很多學者將實證結果解釋成為「建立私有財產權就可以促進經濟成長」。這也帶來了一種傾向，將制度與成長的關係解釋成為簡單的單向作用。在政策層面，這傾向意味著過度強調「治理改革」(governance reforms)，包括掃除貪污腐化、改良管制機制、提昇公司治理等所謂第二代改革。因此很多學者也主張後進國家的當務之急，就是進行這樣的治理改革，並且改革越大規模越好。這其實是錯誤的解讀，會起誤導的作用。

作實證研究必須要設計代表「制度品質」的指標，一般最常用的指標是對投資者所做的意見調查(investor survey)，這樣的指標捕捉到投資者的認知，但是不會告訴我們投資者為什麼會那樣感覺。譬如說，中國大陸目前是外資投資的首選，外商顯然覺得在大陸是「安全」的，雖然說至今大陸並沒有清楚的私有財產權制度！

因此我們可說這方面的文獻，至今尚無法得出很一致的政策意涵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要啟動經濟成長並不需要先進行大規模的制度改革。不過，在成功啟動成長之後，要持續成長確實會需要比較好的制度。我們必須要區分經濟成長的「啟動」與「持續」，而制度品質對於後者比較重要，而非前者。一旦成長機制已經啟動，那成長與制度改良就容易形成一種良性循環，互相影響。

Hausmann-Pritchett-Rodrik (2004) 檢驗了從 1950 年至今全球後進國家中成長加速 (growth accelerations) 的事件，即維持八年持續成長的事件。意外的是，我們找到至少 80 多起成長加速的事件，但是其中絕大多數並沒有事先進行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。反而，它們多數是與解除某種原先存在的限制有關，即放寬對私經濟活動的限制。這種放寬措施，多半顯示執政者在態度上的改變，開始傾向於要走向市場導向的政策方向。而這種「態度改變」本身的重要性其實不低於政策措施。這也可以解釋中國大陸的情況，為什麼它在尚未有清楚私有財產權制度的情況下，仍能夠如此吸引全世界的外商進行直接投資。一旦成長機制已經啟動，則隨著成長而來的、維持成長的需求，就會提供進一步制度改革的誘因與條件，如此就可以有成長與制度改良的良性循環。

因此就政策考量而言，最重要的不是去要求 (各種條件原本就很匱乏的) 後進國家，一味的進行大規模的制度改革。最重要的是去找出最關鍵、最需要解除的限制為何，放寬這限制之後，就比較有可能啟動成長，之後才比較有條件進行制度改革。

關鍵詞：治理改革，經濟制度，經濟發展，財產權

論文摘自：

Rodrik, Dani, 2004/4, Getting Institutions Right,

http://ksghome.harvard.edu/~drodrik/ifo-institutions%20article%20_April%202004_.pdf